

当代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丛书


周洪宇/总主编

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JIAOYUSHIXUE
QIANYAN YANJIU

周洪宇 周采/主编

上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主编简介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研究教育史和教育政策问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等20余部专著。获得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20余次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和学术原创奖。多部著作已输出版权，并入选“丝路书香”等外译工程，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周采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学科组专家，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和西方教育史学史。先后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代表作有《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外国教育史》《比较学前教育》《外国学前教育史》《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派研究》。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研究”和“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



当代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丛书

周洪宇/总主编

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JIAOYUSHIXUE
QIANYAN YANJIU 上卷

周洪宇 周采/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 上卷 / 周洪宇, 周采主编 . — 济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9. 11
(当代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丛书)
ISBN 978-7-5701-0811-4

I. ①教… II. ①周… ②周… III. ①教育史-史学
-研究 IV. ①G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25073 号

DANGDAI JIAOYUSHIXUE QIANYAN YANJIU CONGSHU
JIAOYUSHIXUE QIANYAN YANJIU

当代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丛书

周洪宇 总主编

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周洪宇 周采 主编

上、下卷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2092660 网址: www.sj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51

字 数: 670 千

定 价: 128.00 元 (上、下卷)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4-2671218

总序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和教育学科迅速发展的70周年，还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成立40周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成立40周年，促进中国教育学科特别是教育史学进一步健康发展，促进中外教育学术的交流，我们组织全国多所知名高校的教育史专家编写了这套《当代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丛书》。

20世纪以来，特别是70、80年代之后，伴随着社会变迁、学术进步和教育发展，历史研究包括教育史学在中国和西方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众多新兴领域，成为前沿研究。这套《当代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丛书》试图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来反映和体现当代教育史学的前沿所在，为治史者架起津梁。这套丛书包括《新教育史学》《教育史学研究方法新论》《教育史学前沿研究》《百年中国教育史学》和《百年外国教育史学》等论著。《新教育史学》《教育史学研究方法新论》《教育史学前沿研究》初稿已交出版社，《百年中国教育史学》和《百年外国教育史学》还在进行之中，但前期的资料基础工作已经完成，《中国教育史学70年》（上、下卷）已完稿，近期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酝酿的时间比较长，早在2005年教育部“十五”重点课题“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结题成果《教育史学通论》完成后，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撰写带有探索性质的《新教育史学》和《教育史学研究方法新论》，给教育系、历史系等专业喜欢教育史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专业读物。从2006年起，我借给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讲“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必修课的机会，着手撰写《新教育史学》和《教育史学研究方法新论》，还广泛征求听课同学们的意见，努力提高书稿质量。经过努力，这两本书稿在2015年已初步完成，并计划

联系出版社出版。到2018年3月《教育史学通论》（上、下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出版这两本新著的想法就更强烈了。当年10月我在北京出席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年会期间，遇见山东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蒋伟主任，提及此事，她表示赞成和支持，并提出了充实完善的建议。我们遂在已有两册书稿基础上，增加了《教育史学前沿研究》《百年中国教育史学》《百年外国教育史学》等书，共同组成这套《当代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丛书》。该丛书的出版，一是满足教育学术界的需要，二是作为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成立40周年的献礼。

目前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当代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丛书》，就是各位作者齐心协力、辛勤奋斗的结果。在这套丛书面世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采教授的鼎力相助。周采教授是我40多年前的老同学，当年就是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的才女，名门之后，家学渊源，能歌善舞，并担任学校文工团的主持。我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学校教育系和教育科学研究所，分别从事外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她后来来到北师大深造，攻读外国教育史博士，我则留校继续随章开沅先生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去年10月得知我主编这套丛书的计划后，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她毅然应邀重新出山，与我共同主编丛书中的《教育史学前沿研究》，而且与她的诸位博士保质保量如期完成既定任务，给大家树立了典范。附带说一句，《教育史学前沿研究》每位作者的姓名都在每章后面列出，以示负责。在此，我还要感谢张建东、李艳莉、刘佳、邬春芹等博士，他们分别协助我整理了《新教育史学》《教育史学研究方法新论》和《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三本书稿，为我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我还要感谢二十余年来一直信任和支持我的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诸位编辑朋友。他们是真正的出版人，我的几部获奖图书《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画传》《教育大变革》以及我主编的《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10册）、《中外著名教育家画传系列》（10册）、《中国教育活动通史》（8卷）等，都是经他们之手精心编辑而成的。衷心期待我们的这一次合作，能够继续取得丰硕成果。

周洪宇

2019年7月10日于东湖之滨远望斋

绪论

当代史学趋势与教育史研究

研究当代史学趋势时首先应了解与其相关联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概念。历史哲学是对史学的批判性反思，其发展经历了思辨历史哲学、分析历史哲学和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几个阶段。史学理论是指对历史学本身和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而历史理论则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研究，包括各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19世纪，兰克学派在专业化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成为主流。20世纪70年代末，新叙事史复兴趋势较为明显。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反思文化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全球史研究的热潮。在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史家们力图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相结合，认为史学的未来出路在于将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当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对于教育史研究有诸多启发。我们必须关注和研究当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更新教育史学观念，拓展教育史研究领域，尝试运用新的史学方法进行教育史研究。

一、史学范式的变迁

首先须厘清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几个概念。“什么是史学理论，可以说迄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历史包括人类全部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活动，研究这些学问的就是历史学。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然而，这种只研究历史学本身问题的史学理论，只是狭义的。广义的史学理论应包括历史理论和这种狭义的史学理论。”^①在西方史学史上，很少运用“史学理论”这个术语，而是通用“历史哲学”的名称。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历史哲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关注历史本体论问题，研究者多半是非历史学家；第二个阶段是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关于历史认识的哲学反思；第三个阶段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叙述主义在本质上属于语言性的学术取向。而贯穿历史哲学的思辨、分析和叙事三大范式的基本线索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大致说来，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基调是科学主义的，而思辨与叙述的历史哲学则倾向于人文主义。”^②

在西方，历史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为其《历史》搜集信息的主要方法是询问。修昔底德（Thucydides）则重视人证。他还亲身参与自己描述的战争，并采用耳闻方法进行调查，主要以叙事方式向人们呈现历史真相。由此可知，历史与探究之间的联结相当古老。所谓历史即是以调查研究为根据，针对公共事件而做的一种详尽的、世俗的和散文的叙事。中世纪，基督教开创了线性史观，在发展的观念下，历史被视为一维的、分阶段的和不断向天国靠拢的历程。文艺复兴时期复兴了世俗史，从古希腊的重视人证转向重视文献资料，开创了近代考证史料的传统。“十六世纪以降，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文本方法的使用，所揭露与理解的不仅是上古哲学

①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 周建漳：《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家与诗人的作品，还包括欧洲过去，而这段过去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被称为中古时代。这种技术是档案的历史研究。……凭借这种技术，‘探究’可以上溯到史家或目击者记忆以外的时代，并且摆脱对早期史家与编年史的依赖。这是一个大转变。”^①自19世纪中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1951年，英国历史哲学家W. H. 沃尔什（W. H. Walsh）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两大划界范畴。黑格尔被认为是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汤因比之后，思辨哲学成为绝响。以C. G. 亨普尔（C. G. Hempel）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1942年）发表为标志，进入分析历史哲学的阶段，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英美历史哲学的主流形态。1973年，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发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标志着史学进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阶段。

历史观念的变迁影响了历史编纂。《荷马史诗》是西方史学的滥觞，叙述体裁完整，事件发展连贯，线索脉络清晰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来史学家的楷模，虽缺乏时间的延续性和阶段性。赫西奥德（Hesiod）在《神谱》中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表现出悲观和退化的历史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承袭了其历史退化的观念，并以循环论来勾勒历史的演变过程。希罗德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标志着西方史学的诞生。罗马人的贡献是开始具有“通史”眼光，有了历史连续性的观念。中世纪发展史观在将各地区的历史串成一条线的时候，也就拓展了空间即世界“一统”的概念。

承认人性对历史运动的重要作用的人文主义者的主要贡献，个人的热情和意志被视为历史变动的主因。人文主义史学家提出历史分期思想，其历史著作带有了民族特征。在启蒙时代，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孔多塞明确主张进步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愚昧到文明的进步过程。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论风俗》是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维科的《新科学》

^① [英] 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是近代最早的历史哲学著作。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兰克学派强调对事实的考证和批判，要求正确运用史料和“如实直书”，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法国，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主张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客观分析，总结历史演化的规律。该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遵循直线发展模式，力求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处理历史。科学史学的研究进路注重历史的规律性，注重史料的考证和核实。

G. G. 伊格尔斯（G. G. Iggers）将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阶段，历史学作为一种专业规范诞生；二是中期阶段，历史学面临社会科学的挑战；三是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①1912年，J. H. 鲁滨逊（J. H. Robinson）在《新史学》中批判了传统史学，呼吁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携手共进。G. 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认为：“推动1955年前后开始出现的‘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②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叙事史的复兴趋势较为明显。在社会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先后出现各种史学流派。

与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关系较为密切的有以下三个史学流派。首先是新社会史（the history of society）。“可以说社会史的兴起是当代史学最明显的特征。”^③社会史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学科领域，被用来表示各种不同活动的历史。新社会史是相对传统社会史（social history）而言的。传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都可追溯到伏尔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由20世纪的法国年鉴学派开创。新社会史家强调整体史观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和普通人的群体史。民众日常生活史是西方社会史中最稳定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历史研究的“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揭示了社会变迁的文化和感情的原因。

① [美] 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③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其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总称。如果我们以20世纪之始为分界线，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基本内涵，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则呈现出各种导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存的格局。二战后至6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和法国的L. 阿尔都塞（L. Althusser）等。在新史学的促进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成为西方史坛的劲旅，在继续运用传统方法研究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同时，也将研究拓展到精神状态史、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和大众文化史等领域。

再次是后现代主义史学。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和文化学转向（cultural turn）的夹击下，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出现危机。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兴起，并在七八十年代的欧美国家广为流传。后现代主义史学包括两个部分，即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流派。从诠释学视角看，历史是文本；从文学批评视角看，历史是话语和叙事；从人类学视角看，历史是文化。在“后现代主义转向”（postmodernism turn）的影响下出现了诸多史学流派，主要是新叙事史（主要包括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和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的概念最早见于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年），社会文化史则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术语，第四代领军人物R. 夏尔蒂埃（R. Chartier）希望通过文化史的新途径重新回到社会史。

二、当代史学趋势及其反思

二战后大约每隔30年，西方史学理论都会发生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范式危机”（paradigm crisis），需要新的范式与之相适应。与范式的转换相联系，史家先是追求客观性与科学性的新社会史，继而关注主观性

与哲学性的新文化史，当今又进入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相结合的全球史阶段。

人们曾经将历史学视为一个统一的事业。盛行于19世纪的专业历史学的信念是：各种特殊的历史终将汇集到某种对于人类历史总体的描述之中。这个信念在20世纪时消退了。20世纪初，历史是持续成长的自由故事这样的自由主义概念逐渐受到批判。史家愈来愈普遍以“辉格史”（Whig history）来表示将历史视为本质上属于历史过程的目的论观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把握历史的难度越来越大，以至于没人敢声称某种单一关怀是历史学的“主干”，历史学科呈现出多中心和碎片化的特点。令人注目的是，当代一些关于历史学科综览的作品，多半采取将多位作者的论文编纂成册的形式问世，如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理查德·比尔纳其（Victoria E. Bonnell）等著的《超越文化转向》和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主编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等，每位作者关注的是与整体相对分离的某个特定问题或次一级的领域。到20世纪末，对于某种单一的权威的历史学方法的信念也处于消退之中。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历史学著作和论文被生产出来，这种状况使得单个的历史学家很难脱颖而出，历史学家不再运用单一的方法讲述单一的故事。有学者认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一个是越做越大，一个是越做越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有一个对立面，越做越大的当然是做全球史，越做越小的就是做新文化史，这两个潮流是历史学的新潮流。”^①

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转向文化研究的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对“文化研究”进行了反思。“文化研究”是一个覆盖一系列分析方法——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同性恋等研究的术语。由于“文化”扮演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在上述种种研究领域中没有必然的学科中心，不存在出类拔萃。史学的这种“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强调的是其人文性质而非科

^① 林漫、邓京力：《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载《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

学性质。通过质疑社会范畴的核心概念，文化转向导致了社会范畴的解释的崩溃。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重塑社会范畴亦即社会范畴的重新概念化问题。他们认为，未来的出路在于学科重组，即将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相结合。“尽管我们十分欣赏文化研究在使用文本和语言模型方面所取得的不寻常进展，但是我们依然相信，无论是文化分析方式还是社会学的分析方式，都不能彼此孤立地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富于想象的新方法将它们结合起来。”^①

在有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存在深刻理论分野的问题上，德国史学理论家约恩·吕森（Jorn Rusen）试图寻求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可能途径。他主张走一条中间路线。“一方面我们需要现代主义基础上的科学诉求和确定性为我们提供导向；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叙事主义）为历史思考所做的拓展和深化。”^②伊格尔斯认为，美国历史学家不能理解兰克的历史思想的哲学意义，就把兰克对文献的分析批判与其唯心主义哲学割裂开来，再把这种批判方法和讨论班的组织移植到19世纪的美国，并把兰克尊为“科学派”历史学之父。实际上，“德国不像美国，从来没有把科学一词和自然科学联系得那样密切，它只是意味着用系统的方法来进行任何研究”^③。吕森所说的“科学诉求”正是这种德国意义上的。在他看来，史学理论含义广阔，理性主导的方法论的意义不只是使研究者能够找寻到“事情发生的真相”，还应成为历史学性质与学科研究价值探讨及反思的重要领域。吕森批评说：“即使在今天，还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依然是史料的批评，可见他们并没有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中吸取任何营养。”^④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对理性的激烈批判，在方法上强调叙事的诗性和修

①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转向》，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转向》，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③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④ 尉佩云：《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可能路径》，载《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辞，而非以理性讨论和实证研究规则为主。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下，哲学家的活动有其局限性。虽然叙事主义在史学理论上是一个重要的推进，对于人文学科中历史学科的特性带来了新见解，但忽视了方法上的合理性和真理标准。“我的立场，是试图将当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讨论中相互对立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里面的两种路数综合起来。一方面是叙事主义，一方面是科学合理性，我企图弥合这两者之间的鸿沟。”^①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强调在坚守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同时，重视对多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吸收人类思想和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而形成的，并在西方史学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战后，跨学科的史学方法和一系列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不断出现，不仅使传统史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状况一方面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也要求研究者以正确态度对待西方史学。“对西方史学要做到辩证取舍择善从之，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来不断地丰富自己。”^②还有学者认为，应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总的指导意义，但需要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理论，前者是后者的指导思想。“人们长期以来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史学理论本身，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多数人都同意，这两者是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思想，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因此，历史学的指

① [波兰]埃娃·多曼斯卡主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② 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三十年》，载《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导思想是不能同自身的理论相混淆的。”^①

史学家对于“超越后现代”和“全球转向”表现出极大关注。首先是对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转向是否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所谓“超越后现代”还是用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在考虑问题，因为后现代主要不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理论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和反省。”^②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对“小写历史”（history in the lower case）即对历史认识论的讨论。后现代主义认为虚构与事实没有太大差别，但人们对此观点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存在差异。现在的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难以做到完全客观，语言本身是不透明的，“历史书写”（writing history）本身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其次是全球转向（global turn）的问题。2014年，林·亨特推出的《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被认为是呼吁西方史学的再次转向即“全球转向”的一部力作。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理论的兴起为处于困顿的西方史学写作注入新鲜血液。林·亨特认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全球化关注宏观历史趋势，最好采用长时段的恢宏视野，将其看作一种遍及整个人类历史中时断时续的长期进程，此外，应“采用包括文化理论在内的多元化的研究途径，有助于解决全球化研究中容易受到忽视的方面”^③。她在重申文化转向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关注史学的全球转向的同时，也强调社会科学模式的史学价值，认为应重视史学写作的两个基本范畴即“社会”和“自我”正在经历的脱胎换骨的历程。

三、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20世纪以来形成了诸多史学流派和热点领域，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全

① 陈啟能：《不忘初心，不忘读者——纪念〈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创刊三十周年》，载《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② 林漫、邓京力：《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载《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

③ 赵辉兵：《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写作范式的两次转向——评林·亨特的〈全球时代的历史写作〉》，载《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球史这三大领域中，还有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次级流派和领域。当代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愈来愈广泛，并对教育史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教育史家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教育活动史、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教育记忆史、教育口述史、教育图像史、教育文物史、教育计量史、教育环境史、城市教育史、女性教育史、儿童教育史、课程史学等。鉴于当代史学流派纷呈、碎片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容易使人迷失大的方向，在选择研究方向时，我们有必要了解当代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些专门知识。

首先是教育史学观念的更新。

教育史家都是在一定的教育史学观念的主导下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的。“史学观念是指对历史知识的性质的根本看法。这里涉及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对史料的想法，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认识，对自身在研究实践过程（也就是历史认识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考虑。显而易见，不同的史学观念会产生特点迥异的研究成果。因而正如在任何领域若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发生则必以观念的变革为前提一样，史学领域也不例外。”^①

在西方，19世纪的历史研究从德国开始了专业化历程。专业史家对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充满坚定的信念，信奉真理就在于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基于线性的时间观念，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伟大事件、伟大人物及其思想，探究人的行为的意图，以便重建完整一贯的历史故事。二战后，西方史学完成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化，从以历史过程描述为主的史学逐渐向以理论阐释为主的史学转化。历史学者对基于经验的与分析的社会科学路数的历史研究充满信心，注重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计量史学蓬勃发展，在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哲学的特征是有关历史解释的“方法崇拜”。

在历史哲学中出现的“叙事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将历史非人化

^①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的反动。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和社会科学化史学都提出了疑问，力图取消历史学的真实性，尝试将历史研究与语言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到20世纪末，史学理论朝着文学批评转向，而历史学则聚焦于社会史。“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上，它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①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发展进入“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主义对近现代文化传统的批判已被接受和内化，而其激进做法则被摒弃。在从事教育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应了解世界范围内历史观念发展的来龙去脉，关注其前沿和动态，在此基础上思考究竟应从什么样的教育史观出发来进行研究。

其次是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从西方历史编纂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经历了传统的政治史、社会科学取向的社会史和新社会文化史的不同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到相应学术风尚的影响。在开放和多元化发展的当代，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有着比以往更多的自由和选择，这意味着每一位教育史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专业兴趣，从特定的视野或视角出发，选取相关的研究主题并运用相应的研究方法，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对当代历史编纂模式的总体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比较难的是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如何区分的问题。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并不存在着一个名为“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只不过它有着不同于别的领域的研究主题。“文化这一宽泛的意义和概念却并非要将实践、表象等等东西包容在内。因此，倘若对独立于社会史领域的文化史领域进行界定有用的话，我以为只有从研究取向的角度来这么做。比方说，如果有人在考察社会生活时对于象征物特别有兴趣，那么他就可以将自己称为文化史家。如果有人研究的

^① [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